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科学技术研究计划软科学项目

“双泛”研究译丛

(第二辑)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新疆社会科学院“泛伊斯兰主义、泛突
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及对策研究”课题组

一九九二年一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科学技术研究计划软科学项目

“双泛”研究译丛

(第二辑)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新疆社会科学院“泛伊斯兰主义、泛突
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及对策研究”课题组

一九九二年一月

“双泛”研究译丛(第二辑)

“双泛”研究课题组编译

主 编: 杨发仁

责任编辑: 何培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 16 号)

新疆社会科学院微机排版

新疆地矿局测绘大队制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875 字数: 280 千字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 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资料出版许可证第[752]号 定价: 10.00 元

目 录

有关泛突厥主义的几个问题(代前言).....	(1)
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简论	(18)
一、俄国的泛伊斯兰主义.....	(18)
二、国家议会穆斯林党派的活动.....	(52)
三、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	(77)
四、苏丹——加里耶夫派.....	(97)
五、突厥思想体系的危机	(113)
突厥主义原理.....	(127)
一、突厥主义的历史	(127)
二、什么是突厥主义?	(133)
三、突厥主义与土兰主义	(137)
四、文化与文明	(140)
五、面向大众	(149)
六、朝向西方	(152)
七、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唯心主义	(160)
八、强化民族意识	(166)
九、加强民族团结	(170)
十、文化与自我完善	(177)
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民族统一主义研究.....	(182)
一、导言	(182)
二、境外突厥人：土耳其之外泛突厥主义的兴起和没落 ...	(185)
三、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泛突厥主义：起源与繁盛阶段	(198)
四、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的泛突厥主义：蛰伏阶段	(223)
五、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的泛突厥主义：复苏阶段	(244)
六、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的泛突厥主义：重振阶段	(266)
七、结语：泛突厥主义是种民族统一主义现象	(286)

有关泛突厥主义的几个问题

(代前言)

陈 廷 琪

本集编入的三部著作是：一、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政治学教授、中东历史与政治协会主席雅各布·莫·兰道著《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民族统一主义研究》(伦敦 1981 年版)；二、著名的泛突厥主义经典作家孜牙·乔加勒甫(1876——1924)著《突厥主义原理》(雷登 1968 年版)；三、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教授哈·扎·加比杜林(1897——1940)和阿·米·阿尔沙鲁尼(1896——1985)著《俄国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简论》(伦敦 1990 年版)。前两部著作以论述泛突厥主义为主，兼及泛伊斯兰主义。后一部著作的作者认为：“很难说泛伊斯兰主义者有什么严密的纲领和策略，有一系列具有泛伊斯兰纲领性质的文件，但是所有这些文件都使我们深信，与其说是泛伊斯兰纲领，不如说是泛突厥主义纲领”。他们在分析研究俄国实际时提出：“泛突厥主义者往往利用泛伊斯兰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阶级本质。他们在斗争的个别时期，一面求助于泛伊斯兰的词句，一面也甚有成效地利用突厥—鞑靼人民群众的自发的革命力量，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服务。”泛突厥主义始终同“泛伊斯兰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虽然偶而对它有所攻讦，却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同它公开分裂。”显而易见，作者论述的基本方面依然是俄国的泛突厥主义。由此可以说，这三部著作基本上是论述泛突厥主义的，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泛突厥主义的由来和发展；二是泛突厥主义的理论。通读这近 30 万字的译著，我们可能对

以下几个有关泛突厥主义的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泛突厥主义的摇篮

泛突厥主义出现之前，欧洲曾掀起两次以突厥为主题的活动。第一次是收集土耳其手工艺品和书画的热潮。第二次是所谓的“突厥学”活动。大批俄国、法国、匈牙利、丹麦、德国和英国学者，开始对古突厥人、匈奴人和蒙古人进行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他们力图证明：突厥人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历史上曾多次建立世界性帝国，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这些活动不可能不对操突厥语的民族中的一些知识分子产生深刻的影响，不可能不诱发这一部分人的新的民族主义思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沙皇俄国境内鞑靼人中的少数知识分子首先受感染，萌发了泛突厥主义的根苗，成为发起和传播泛突厥主义运动的最早的领导人。为什么泛突厥主义的摇篮在鞑靼，而不在土耳其呢？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鞑靼，特别是克里米亚鞑靼距离土耳其较近，受其各方面的影响较深。第二，对俄国推行泛斯拉夫主义的一种反动。泛斯拉夫主义者宣称：土耳其将从欧洲政治舞台上消失，南方斯拉夫种族将继承那个东方帝国。19 世纪沙皇俄国统治中亚地区后，开始推行天主教化和俄罗斯化等泛斯拉夫主义的步骤，激起了当地少数民族坚持自己信仰和民族渊源的强烈抵制。鞑靼人受沙俄统治年代最长，受天主教化、俄罗斯化压力最甚，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反抗也最激烈。第三，17 世纪以来，鞑靼人中已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活动积极、呐喊民族觉醒的以工商资本家为代表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成为泛突厥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第四，鞑靼人和亚洲穆斯林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中心——中亚的密切的商业往来，以及数百名鞑靼青年去中亚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对泛突厥主义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五，从经济原因上讲，俄国征服中亚后，鞑靼人的商业资本丧失了在中亚的垄断地位，面临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步步进逼，鞑靼工商资产

阶级被迫组织力量与之抗衡，必然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武器。由于喀山鞑靼较早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泛突厥主义在那里找到了适于其发展的土壤。

鞑靼知识分子意识到：由于操突厥语的各个民族没有一块共同的居住区域，只有找到或者培植其他的因素才能促进他们互相接近。在其他的诸因素中，首先考虑的显然是语言因素。因为操突厥语的各个民族虽方言各异，但毕竟属于同一个语族。在这方面，主要的困难是各种民族语言的差异和大批文盲的存在。作为通向“联合”的第一步，首要任务是减少文盲和为文化交流创造一种新的共同的语言。因此，鞑靼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初期活动集中在教育、语言改革和报刊宣传三个方面，由此产生了名为“艾苏勒扎吉德”（意为“新教学法”）的浩大运动。被称为泛突厥之父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思马伊勒·伽思普林斯基则是这些活动的终身思想鼓动家。他于1883年4月10日创办的《翻译者》（或称《译文报》）是泛突厥主义最重要的一种俄文杂志，其经常出现的口号是“在语言、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其语言改革的一个目标是致力于“清除”所谓的“外来语”（即突厥语中的俄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创制一种介于土耳其突厥语和鞑靼语之间的共同的文学规范语言。在鼓吹这种混合语言取得初步成功后，《翻译者》日益公开地宣传俄国所有“突厥人民”通过建立政治组织，为争取民族复兴而联合起来。很显然，从此以后，泛突厥主义已不局限于文化领域，开始进入政治领域。

1904——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的制宪声明，国家杜马的召开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民主化和自由化事件，给泛突厥主义登上俄国政治舞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1905年8月15日，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的召开、穆斯林“团结”联盟的产生和以后改为政党就是一个例证。但这只是一个松散软弱的组织，没有最终的政治目标，没有一个民族集团具有足够的实力，能被其他集团承认为主要的领导力量。在要不要反对沙皇专制统治这个问题上，鞑靼的资产阶级已经从原来反专制的立场上大大倒退了一步。他们自称是“俄罗斯专制制度最为忠诚的臣民”，准备用“合法的途径”同泛伊斯兰主义、社

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这一切都说明俄国鞑靼的泛突厥主义者在其自身阶级利益的驱使下，已经从专制制度的敌人变成了奉公守法的臣民，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在俄罗斯资产阶级的步步进逼面前保护自己，在俄国资产阶级内部争得一席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对泛突厥主义者的态度也由反对遏制变得容忍客气了。我们仅从官方对其首领人物伽思普林斯基的评价就可见一斑。一个上校保安局长给警务司的报告中称他“有大量不动产，在穆斯林中颇具声望”，“其政治信仰，赞同‘统一’党10月17日的党纲，1905——1906年绝无过激的政治表现。”

1917年二月革命后，许多政治组织死灰复燃，其中包括在第四届国家杜马穆斯林党派形成的俄国穆斯林临时中央委员会。1917年5月该委员会筹备主持召开的首届全俄穆斯林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一次显示穆斯林团结的会议。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操突厥语的一些民族代表。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一个所谓统一的民族实体、使用泛突厥语言——即伽思普林斯基的“共同突厥语”的想法，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但是由于彼此地理位置遥远，思想方法迥异以及互相利益的冲突，在社会改革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代表大会未能通过一个全面的共同的行动计划。泛突厥主义者只能将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具体化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但尽管如此，鞑靼仍然不失为泛突厥主义产生的摇篮。可以这么说，泛突厥主义实际上是俄国现实的产物，它在土耳其只是找到了拥护者和崇拜者。

二、泛突厥主义在俄国的衰落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突厥集团领导人希望独立，实现泛突厥主义联合的欲望急剧膨胀，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冲突已无法避免。以“独立”为口号的叛乱在奥斯曼帝国干涉军的支持下发生了，一些民族地区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其结局是全都遭到失败。俄国的泛突厥主义

运动从 1905 年走上政治舞台，到 1918 年穆斯塔法·乔喀耶夫（1890——1914）“浩罕独立政府”被推翻，走向衰落，不过只有十多年的时间，为什么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运动在俄国如此短命呢？原因可能有这么几条：

第一、泛突厥主义运动组织的松散性。尽管鞑靼资产阶级挑起了泛突厥主义的大旗，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实力，缺少建立有效政治组织的经验，没有能在泛突厥主义运动中形成公认的领导核心。加之利益互相冲突的地方民族主义，凌驾在泛突厥主义的共同利益之上，使这些分散的集团无法实行真正的政治合作，无法采取一致的具体行动。

第二、泛突厥主义带有分裂主义特征的思想，始终得不到渴望统一、渴望安定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另外，泛突厥主义比较新颖，政治色彩较浓，没有文化的人很难理解，它主要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行，缺乏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三、泛突厥主义在理论上缺少一个完整的严密的体系，导致一些政治领袖们行动方针的大相径庭。加之泛突厥主义政党虽有一个纲领，却缺少了党纲的灵魂，没有最终的政治目的。这样一个缺乏完整系统理论指导，先天不足的所谓政党及其领导人，根本无法与以列宁为首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有深厚群众基础的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相抗衡，一上阵还未交手就败退了下来。

第四、苏联党和政府连续不断、行之有效地反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其主要措施：一是利用宣传舆论工具，动用各种语言的期刊、小册子谴责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是封建反革命分子鼓动的分裂主义运动，是地方民族主义的工具；二是在 1921 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全党进一步批判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导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三是组织学术界进行持久的批判。如 1963 年出版的奥塔·吉金奈什维里的专著《泛突厥主义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政策》，有力地论证了 1918 年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扎雷人的泛突厥主义还远未过去。它依然存在，并且继续被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加以利用；四是为新的地域单位划分疆界，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强调各民族语言文化的特殊性，同时淡化所谓“突厥”民族的共同性；五

是在学校推广俄语教育；六是清洗了政治上不可靠的泛突厥主义知识分子；七是对穆斯林与泛突厥主义者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穆斯林采取教育方针，而对后者则采取遏制政策。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确实产生了效果：自 20 年代中期，特别是后期以来，苏联不再存在有组织的泛突厥主义活动。

尽管有组织的泛突厥主义活动在苏联已经没落，但是泛突厥主义的情绪依然存在，并以保护突厥语言的活动和文学著作的形式表现出来。如 1926 年巴库突厥学家代表大会上，来自伏尔加地区的一个代表公开宣布：“我们突厥人不能自相隔绝”，呼吁建立一个“突厥语言联邦”。几乎所有突厥学者的学术论著、文学作品全都强调他们历史上的伟大成就，以此唤起所谓的突厥民族的优越感和自尊心，认为自己既优于伊朗血统的近邻如塔吉克人，也优于俄罗斯人。凡此种种想要说明突厥曾怎样影响了伊朗和俄罗斯文明的企图，全部都带有明显的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这方面的较近例证是 1972 年以俄文发表的《突厥斯坦的失败》。作者自称那是一部“纪实小说”，它回述了“大突厥斯坦”的拥护者在二次大战期间是如何帮助纳粹反对苏联的。

三、泛突厥主义未能拯救奥斯曼帝国

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出现稍晚于俄国，开始于 20 世纪初叶的奥斯曼帝国(1290——1922)最后的日子里，并在帝国解体以后迅速发展到一个高潮。

在这以前，奥斯曼帝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突厥”一词带有某种贬意，而推崇奥斯曼主义型的民族主义。后来，受欧洲突厥学活动的影响，帝国的许多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似乎重新发现了”他们过去的那段历史，并开始引伸、发挥和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内吉布·阿西姆(1861——1935)翻译利昂·卡洪的法文著作《亚洲历史导论：至 1405 年的突厥和蒙古》时，就按照子虚乌有的“土兰”的脉络添加了很

重要的几节，此举并非无意。译者着意赞美蒙古及其业绩，声称突厥是他们的后裔。这部译著不仅助长了土耳其境内一部分人对突厥渊源及历史遗产的自豪感，诱发了某种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所谓的“突厥民族”感情，也刺激了中亚地区突厥语族的一些民族的感情。以后的泛突厥主义政治作家将这种感情，引伸到政治方面，以唤起“突厥民族”的觉醒。孜牙·乔加勒甫(1876——1924)1911年写成的诗篇《土兰》就是个代表作。他在诗中发出了泛突厥主义的呼唤：“突厥人的故乡既非土耳其，也不是突厥斯坦，故乡是块广大、不朽的地区——土兰！”另一个最有号召力的泛突厥主义政治作家是穆罕默德·伊敏·尤尔达迪勒(1869——1944)。他的诗集《为了土兰》更具有煽动性，《觉醒吧，突厥》这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啊，突厥种族！啊，铁与火之子！啊，一千个祖国的创建者！啊，一千顶王冠的佩戴者！”土耳其著名女作家哈立德·艾迪甫则通过小说《新土兰》的人物鼓吹“世界上如今有8000万到1亿源自突厥的人民。这个不断增长的突厥大众生气勃勃，将永远存在、增长下去，……应该利用那些从人民精神深处喷涌出来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家。”突厥学的创立和研究；泛突厥主义作家的呐喊和鼓吹；奥斯曼帝国在利比亚、巴尔干的失败和帝国内非突厥人的分离主义暴动，使越来越多的土耳其突厥人感到泛突厥主义有可能成为唤起土耳其民族觉醒的兴奋剂和拯救奥斯曼帝国的一帖灵丹妙药。

在奥斯曼帝国后期里，泛突厥主义受到国家政治领导层一部分人的青睐，因而得以在有利的环境中有效地组织起来。“青年土耳其”的主要政治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在一段时间里曾经用泛突厥主义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某些“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不仅在国内加强突厥化，而且有意识地对亚洲操突厥语的民族采取泛突厥主义的方针，以抵销失去非洲、欧洲给奥斯曼帝国造成的损失。1910年以后，这个委员会派遣人员到高加索、突厥斯坦、伊朗、印度、埃及、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克什米尔以及中国新疆，进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并和土耳其境外的著名泛突厥主义活动分子建立了联系。

泛突厥主义所以能在土耳其发展起来，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来自沙俄的政治移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 10 多年，由于沙皇政府的监视、控制，鞑靼的泛突厥主义政治家有的遭驱逐，有的自动出走。他们中有不少人定居在奥斯曼帝国，进入伊斯坦布尔等地的大学深造，并成立了诸如鞑靼移民联合会、俄国移民学生联合会、克里米亚移民学生联合会等许多政治团体。有人估计，当时奥斯曼帝国的鞑靼移民甚至比克里米亚还多。伽思普林斯基、阿克楚拉、阿加奥卢、阿里·胡赛因扎德是其中著名的代表。阿伽奥卢等人的关于“奥斯曼帝国境内、外突厥人都是一家，全是同胞兄弟”的观点在土耳其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阿克楚拉是几乎每一个具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组织的创立者，或至少是其中非常积极的成员，同时几乎为每一种重要的泛突厥主义杂志撰稿。他所主编的《突厥故乡》成为宣传泛突厥主义的主要论坛。他将所有源自突厥的人，即鞑靼、阿扎雷、吉尔吉斯、雅库特等，总称为“突厥民族”，强调突厥世界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明确的文化联系和血缘、种族纽带，鼓吹为共同事业而联合行动。阿克楚拉在泛突厥主义理论方面主要是坚持泛突厥主义的政治作用，强调以奥斯曼帝国为中心，并以俄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作为过去和未来的敌人。

由于“青年土耳其党”首领恩维尔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和反俄方针，奥斯曼帝国站在同盟国一边参战。作为回报，德国允诺支持土耳其改变其东部边界，从而与俄国的穆斯林连成一片。大战初期，土耳其和德国的特务在中亚地区穆斯林中频繁地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1915——1916 年间向俄国中亚、阿富汗和中国新疆地区散发了成千上万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小册子；1917 年在布哈拉挑起泛突厥主义的民族情绪，而在高加索则忙于转运金钱和枪支。这类活动不仅在俄国境内达到空前的地步，而且很快地扩展到中国新疆。恩维尔显然想建立一个土耳其——突厥帝国。这是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黄金时代。1918 年 9 月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恩维尔逃亡德国。1921 年恩维尔以“突厥斯坦艾米尔”的称号，在俄国中亚地区亲自指挥巴斯马奇军队，组织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他在给俄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中声称：“布哈拉、突厥斯坦、希瓦人民自由、独立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苏俄必须承认这种独立”。1922 年 8 月，恩维尔被红军击毙，几乎是同时，

青年土耳其党“三雄专政”之一的杰马勒，也遇刺身亡。青年土耳其党企图以泛突厥主义拯救奥斯曼帝国的幻想就这样破灭了，泛突厥主义未能拯救奥斯曼帝国，连同它的领导人一起做了殉葬品。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也从颠峰跌入了低谷。

四、泛突厥主义遇到凯末尔主义的抵制和遗弃

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失败崩溃的命运。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把保卫家乡、反对侵略放在首位的独立战争，获得了人民的支持，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认为“伊斯兰团结和土兰主义都不能成为我们的原则或必然的政策。因此，新土耳其政策是坚持独立，立足于土耳其民族边界之内自己的主权之上。”可见，凯末尔主义的正式国家思想中强调的是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实际利益，拒绝过分关心境外其他操突厥语民族的利益。而后面的这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是泛突厥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它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这是凯末尔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最重要的不同点。凯末尔放弃泛突厥主义思想，不仅有利于集中力量从事国内建设，迅速医治战争给土耳其带来的创伤，而且有利于改善土耳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助于实现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一些著名的泛突厥主义分子有的摇身一变成为热情的凯末尔主义分子，为新诞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服务，有的相继去世，泛突厥运动丧失了大部分领导人物，真正拥护泛突厥主义的人数很少。可以这么说，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的20年间，泛突厥主义运动就整体而言处于蛰伏状态，没有什么明显的活动。断断续续出版的一些书刊作为联系泛突厥主义分子的纽带仅起了些煽风点火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几乎没有，零星的四分五裂的几个组织相互争夺领导权，常常因思想理论上的微小差异而争论不休，成不了气候。这一时间泛突厥主义的活动仅限于中欧和西欧的一些都市，在土耳其它不仅受制于不利于发展的环境，而且遭到

颇为厉害的反对。土耳其政府并不赞许和鼓励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

五、泛突厥主义的反苏反共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处于蛰伏状态的泛突厥主义带来了一线生机，使它又复苏起来。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之后，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出版物变得更加好战，其狂热程度与德军的军事胜利恰成正比。泛突厥主义分子不顾土耳其政府已经宣布中立的立场，敦促土耳其对苏开战。他们向土耳其总统伊诺努呼吁：“历史为这个伟大的时刻而选择了你。我们已作好准备，为突厥民族神圣的独立抛洒热血！”“权利不是给予的，应该去争取。通过战争吗？是的，必要时就通过战争！”这是泛突厥主义运动阶级本质的最好暴露，其反动性是无容置疑的。纳粹德国也利用泛突厥主义，用领土扩张来诱惑土耳其对苏宣战。但是所有企图推动、促使土耳其政府放弃中立的压力全部没有奏效。

土耳其政府慑于苏联的强大，不愿意也不敢放弃中立立场，而泛突厥主义者却认为，现在已到了集中力量将土耳其拖入反苏战争，实现“突厥民族”统一的最后关头。这样一来，泛突厥主义者与土耳其政府的公开冲突已经不可避免。著名的泛突厥主义分子阿齐兹于1944年2月20日、3月21日通过《鄂尔浑》月刊两次公开致信给政府总理，谴责共产党人在土耳其搞“颠覆活动”，要求实行积极的突厥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政策。5月3日，泛突厥主义分子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性游行反抗所谓共产党人渗入土耳其政府官员队伍和教育系统。6天后，30多名主要泛突厥主义分子被捕，政府通过报刊、演讲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泛突厥主义的运动。16天后，土耳其总统为这场运动定下了批判的基调，他发表演说宣称：土耳其是个富有理智的民族，是个民族主义的国家，而泛突厥主义是种有害的现象，会将国家拖入与邻邦的对立中去。他严厉指责泛突厥主义分子正在组织秘密集团，图谋危害

土耳其。冲突的结果，泛突厥主义组织遭到取缔。然而对其领导人的审判，反而使公众受到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熏陶，使公众产生了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民族主义者的错觉。被捕领导人的无罪开释，更使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大受鼓舞。此时，泛突厥主义运动的重点是呼吁种族主义，号召反共。其主要内容是：(1)泛突厥主义的原则是“一种民族联合”，其地域应包括从保加利亚到阿尔泰山广阔地域上具有相同血统、语言、历史、传统、文化的 6500 万突厥人；(2)“突厥种族优于其他种族”，泛突厥主义者是那些“准备为了突厥民族甘愿成为 20 世纪殉道者的人”；(3)泛突厥主义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突厥人能够生活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国家，同时帮助苏联枷锁下的所有突厥人民争取独立。每一个突厥人都要“为反对不共戴天的仇敌莫斯科而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土耳其泛突厥主义企图重振旗鼓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战后，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并没有消声匿迹，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出版物注重现实政治，致力于反共事业，而且为对抗共产主义寻求可能的盟友。这里以与新疆有关的两个刊物为例：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和孜牙丁·巴巴屈尔班编辑的《突厥斯坦：学术、社会、经济与文化月刊》(1953 年创刊于安卡拉)的许多文章和诗作直接批判所谓的“红色帝国主义的罪行”，攻击我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谴责苏联所谓“种族灭绝政策”。另一个刊物《突厥斯坦》由于连篇累牍地刊登新疆民族败类艾沙·玉素甫等人的泛突厥主义文章，使这个标榜以研究历史、文学为主的刊物，始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反共意识，该刊声称它的“民族概念”是“整个突厥斯坦的完全独立”。为此，它愿与阿扎雷和高加索鞑靼合作，争取从印度尼西亚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争取中国国民党等其他共产主义敌人的帮助。

六、当代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

20 世纪 50——60 年代，泛突厥主义者依然一直坚持努力通过出

出版物这个他们最熟悉的手段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并致力于建立一些团体，以进一步使这项事业政治化。到1965年，这种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个由某些著名泛突厥主义者领导的集团控制、掌握了土耳其一个中型保守党派——共和农民与民族党（后改名“民族主义行动党”）的领导权。泛突厥主义成为该党的正式宗旨之一。这是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重新崛起的重要标志。该党在土耳其历次大选中命运多变，被许多人视为极右组织之一。它从未成为群众性大党，无法动摇和取代稳居国民议会核心的自由主义温和派——公平党的地位。尽管如此，由于自1973年以来，土耳其一直由多党内阁执政，该党在1975—1977年间也成为联合政府内阁成员之一。该党领袖蒂尔凯什还当上了副总理。他在被当做党的指南的《九道光彩》的头两章中坚称：“民族主义意味着支持所有突厥人，理想主义则意味着致力于使土耳其境外的突厥人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以上说法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他在《1944年民族主义案件》一书中的陈述是再明白也没有了：“土兰，就是突厥人的联合，意味着不仅联合亚洲突厥，而且联合所有突厥——一种精神、传说、文化、宗教的联合。”如果说以上只是一种思想的话，那么他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与塞浦路斯》中所讲的已经具体化为一种具有扩张野心的对外政策。他的这本书认为塞浦路斯与安纳托里亚、西色雷斯、萨路尼卡一样都应属于土耳其。与此同时，土耳其境外的以突厥命名的团体不断增多。这些团体不断在全世界、特别是穆斯林中争取对他们事业的支持。这方面颇为活跃的是“东突厥斯坦政府秘书长、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主席”艾沙·玉素甫。他曾准备了一份题为《有关穆斯林大会已通过决议但未付诸实行的伟大突厥斯坦备忘录提交所有穆斯林及爱好和平国家的政府及首脑》的文件，分别于1962年提交卡拉奇、麦加召开的世界穆斯林大会；1983年提交给麦加的世界穆斯林联盟会议以及1964年提交给麦加的伊斯兰代表大会。

20世纪70年代期间，由于许多土耳其人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加之政府要求对境外突厥人之类的棘手问题采取审慎方针，蒂尔凯什领导的民族主义行动党一度也不再频繁地表明他们对境外操突厥语民族的泛突厥主义感情。泛突厥主义的许多活动仍然

只是在书籍和报刊的出版方面。各种书籍及小册子一方面继续讨论泛突厥主义的本质和价值，另一方面却没有遗忘境外操突厥语的其他民族的情况。1977年出版的《突厥人民的斗争》就是一本主要论述所谓“被压迫突厥的斗争”的论文集。作者攻击苏联境内操突厥语民族失去自己的语言，被迫说“一种马克思主义语言”，要求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政府”，指责土耳其各政党忽视了“被压迫突厥”，呼吁它们为同胞的个人自由和文化权利而斗争。该书观点，后来又得到艾尔肯（艾沙的儿子）的补充。他在《维吾尔突厥》（1978年出版）中，把维吾尔族也说成突厥民族，同时通篇反共言词，恶毒地攻击“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不公正地对待维吾尔人。”作为泛突厥主义和民族主义大本营的安卡拉“突厥文化研究所”出版的《突厥人世界手册》中的“当代突厥世界”部分，长达400页，全部是论及突厥人世界必须联合起来的问题。1979年伊斯坦布尔出版的《青年人的目标》杂志，其“解放全世界突厥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口号更加露骨。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许多诗集、散文集的泛突厥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它们也迫不及待地呐喊：青年理想主义者团结起来，带头前进，为了境外突厥而积极行动。

可以这么说，自1965年以来，由于民族主义行动党的组织和宣传，泛突厥主义再次颇为成功地被引入了土耳其的政治，逐渐在土耳其国内政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当代泛突厥主义的活动区域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泛突厥主义研究专家雅各布·莫·兰道认为：“19世纪末时，它主要在国外活动，土耳其只有少许的表现。100年后，国外只剩下了分散零星的泛突厥主义迹象，而土耳其则出现了持续的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和政治运动。它虽然未能成为土耳其的流行思想或群众性运动，但近年来，它（与伊斯兰复兴一起）确实具有了一定的重要性，足以引起国家总统于1976年发出公开谴责。然而，自1980年的军事管制之后，所有政党和政治组织关了门，泛突厥主义的公开组织因此也成了一个疑问。”100多年来，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中，虽然时起时伏，但一有重大事件出现或面临重要的政治关头，就要出来表演一番，它象一个幽灵，时隐时现，却从未退出政治历史舞台。